

以榜单评选等多种形式聚焦城市文学，业界呼唤更多能够回应时代的作品

城市离我们很近，而我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近日，《青年文学》发起的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揭晓，12部中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进入学界与读者视野。而就在不久前，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二期也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题，试图探讨当下青年作者如何以创作回应当下城市。作家金宇澄则干脆在访谈中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文学同样会完全转向城市书写，完全会把城市作为作者的故乡，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

这似乎是一个积极信号——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业界读者都对于城市书写越发关注。而盘点、研讨过后的意犹未尽也带来更多的期待。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无疑又为这种期待增添一分焦虑。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所说——城市离我们很近，我们离城市文学还很远。

如果说乡土文学是寻根与回望，那么城市文学更注重自身与面向未来

要讨论城市文学，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城市文学。这个问题似乎是容易的，与乡村书写相对应的，讲述城市中人和事的作品好像都可以被归类为城市文学。盘点“城市文学”榜单上的作品，也可以看到，自媒体、自由潜水、高尔夫球这些兴起于这个时代的产物，已然进入文学的视野。

简单以题材二元分类背后，是当代文坛发展不均衡的投射。上世纪三四十年的文学世界，或许没有城市文学的标签，却有无数经典作品对于城市生活精准地提炼与反思。茅盾笔下的上海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互为补充；老舍笔下的北京与张恨水笔下的北京各自精彩，他们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城市文学风貌——写的是城市，更意在体察城市

中人的精神境遇。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文学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现代化进程而被重新提起后的数十年间，出版得最多、评论最多、得奖最多的仍然是乡土文学。而这也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一部《繁花》何以成为现象级作品，让业界如此兴奋——从城市出发、为城市而歌的声音始终是弱了一些。即便偶有佳作、力作，学界却很难从其中厘清一条清晰的文脉，形成一个具有城市书写自觉的创作群体，既能精准把握城市在时代变革中的风云变幻或涓涓细流，又能直击当代人在城市生活中精神困境的最大痛点，引发社会广泛的共鸣。

“城市文学”排行榜的推出，在文学史上尚属首次。“在《青年文学》主编张菁看来，传统的文学构造正在发生变化，“城市文学”表征人们生存空间的多向度和时代精神的复杂，因而具有多种可能性。理性的“概念中的城市”与人们体验到的鲜活城市之间富有创造力的张力，共同提供了城市空间的象征与想象。而文学在这一基础上，也提供着对其他各类文化形式更基础的储备与滋养。她同时指出，必须看到眼下的城市书写，相当一部分还只停留在对城市生活元素的运用，以及城市生活场景向文学的迁移之中，缺少与城市发展相对应的现代意识，进而透析表象，提供精神层面的思考。如果说某种意义上，日趋成熟的乡土文学更多地是基于作家的成长经历与历史回望，那么“城市文学”更应当是面向自身和未来的文学”。

聚焦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关系

必须承认，对于巨变中的城市与审美不断提升的当代读者，文学创作的难度更高了。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博士导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认为，城市文学是当下正在兴

起和构建的文学。这使得城市文学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城市文学也有了极大的机遇。他说：“在一切未果的时代，人内心隐晦的巨大困惑、矛盾和迷惘以及欲望与克制、困难与希望等，也格外复杂和丰富。作家如果能准确地感知和捕捉到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一定是一个文学的大赢家。”

如果说已经成名的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凭借的是早年乡村生活经历与此后城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冲撞，那么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青年创作者，也有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何平就注意到，参与双城文学工作坊的绝大多数城市文学书写者，已经掉掉了乡村记忆的那一块拼图。“当他们去记录世界、想象世界时，就会诞生属于他们的可能性。”为此，他特别提到宝岛台湾青年作者林秀赫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厨房》。故事里的台北年轻人研究烹饪并记录在博客上，透过博客，他为自己物色到食客“知音”，两人的关系伴随美食与交谈拉近，最终又戛然而止。何平说：“这只能是这个时代发生的故事，也只能是这个时代人与人才有的情感关系。”

城市个体面对精神世界困境的茫然与挣扎在青年作者的笔下一一展现开来，蔡东的《照夜白》里擅长话术的高校教师与电台主持人，在沉默中获得精神的舒展；徐则臣的《兄弟》将当代人的“身份认同”置于城市边缘人语境之下；张怡微的《步步娇》以一场简陋的葬礼检视都市三代人对于生老病死的百态世相。而这些，也就成为文学照进城市的一束光。

此外，排行榜中须一瓜的犯罪类型写作《甜蜜点》入选其中。而一同上榜的陈楸帆创作《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也在科幻色彩基础上以纪录片式的叙事，畅想关于人类非自然生育的话题。这些作品的纳入，不仅扩充了城市文学的外延，也推进着文学的更多可能。

相关链接

2018“城市文学”榜单

(专家推荐榜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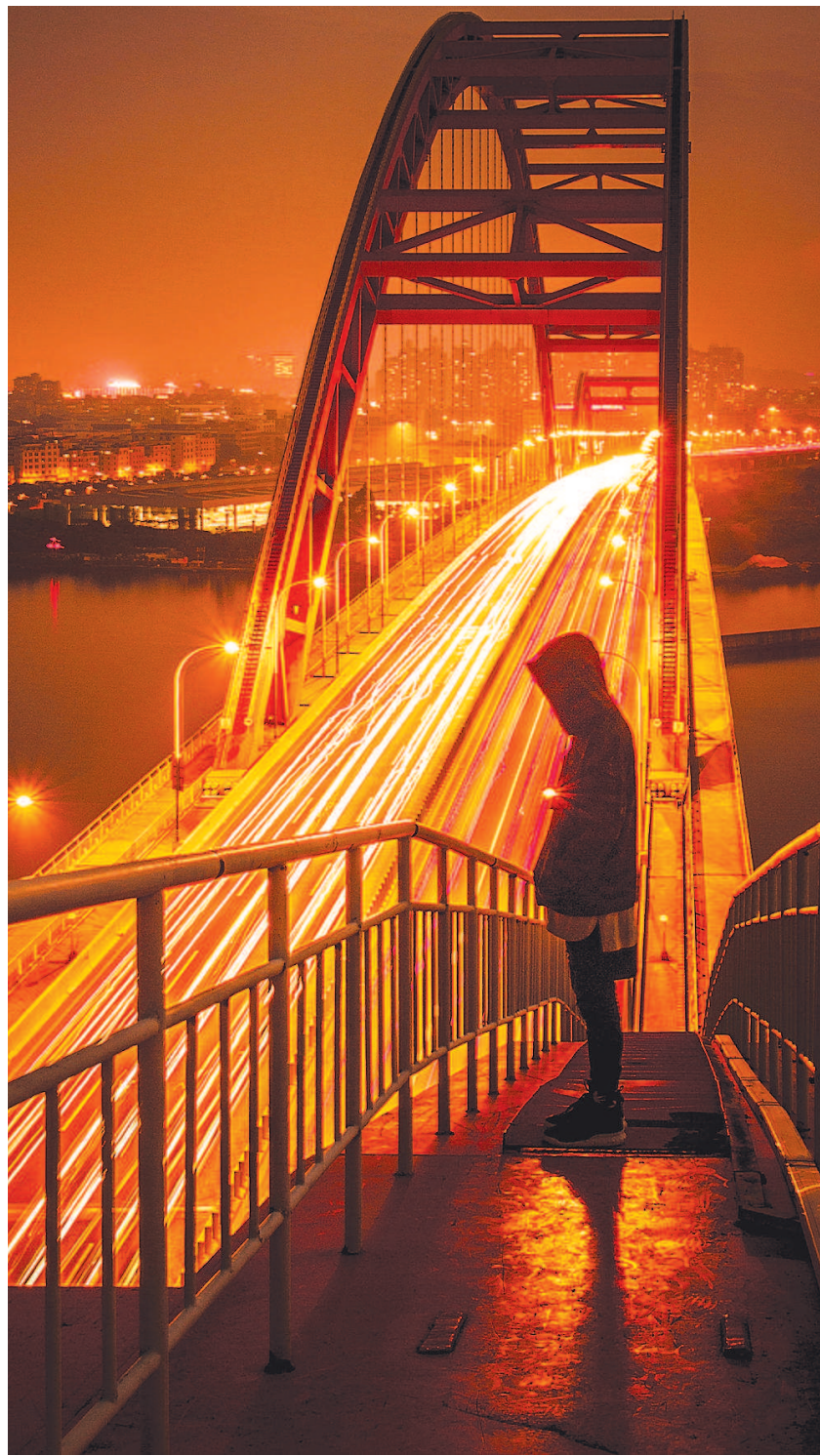
对“城市文学”的坚持和展望，让更契合时代的作品照亮世界，抚慰人心，一直是《青年文学》的努力方向。青年文学杂志社发起的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最终产生专家推荐榜和读者人气榜，专家推荐榜如下：

中篇小说榜

《琢光》，计文君，原载于《收获》
《基本美》，周嘉宁，原载于《收获》
《绕着仙人掌跳舞》，鲁敏，原载于《大家》
《甜蜜点》，须一瓜，原载于《当代》
《小花旦的故事》，王占黑，原载于《山西文学》
《白》，陶丽群，原载于《青年文学》
《多普勒效应》，王威廉，原载于《江南》
《枪墓》，班宇，原载于《山花》
《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陈楸帆，收录于合集《人生算法》
《大师》，刘汀，原载于《青年作家》
《海上列车》，郭楠，原载于《收获》
《婚姻生活》，阿袁，原载于《长江文艺》

短篇小说榜

《香蜜漏了》，邓一光，原载于《花城》
《兄弟》，徐则臣，原载于《大家》
《唯有大海不悲伤》，邱华栋，原载于《人民文学》
《美弟》，林那北，原载于《人民文学》
《换肾记》，任晓雯，原载于《当代》
《照夜白》，蔡东，原载于《十月》
《原则先生》，小珂，原载于《天涯》
《读书会》，周洁茹，原载于《上海文学》
《法力》，张悦然，原载于《收获》
《离岸流》，凌岚，原载于《青年文学》
《步步娇》，张怡微，原载于《小说界》
《女儿》，双雪涛，原载于《作家》



如果说已经成名的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凭借的是早年乡村生活经历与此后城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冲撞，那么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青年创作者，也有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在书写城市的同时，当代青年写作者更关注城市里人的精神困境与个体成长。当他们去记录世界、想象世界时，就会诞生属于他们的可能性。

图/视觉中国

对谈录

从青春文学到长篇小说新作《景恒街》，80后作家笛安转向描摹都市创业人群心路

“城市乡愁”的书写，早该占据一个合理位置

嘉宾 笛安（青年作家） 采访 许畅（文汇报记者）



笛安长篇新作《景恒街》推出单行本。（出版方供图）

她是125万微博粉丝口中的“美笛”“美老师”，她的“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是国内青春文学的亮眼之作；前不久她摘得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凭新作《景恒街》成为最年轻得主。

80后作家笛安，依然着迷于写爱情，写欲望，写不甘心，只是这次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广阔却又分外幽微的都市人心，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融入办公室政治与爱情的情节，对一夜成名的综艺偶像、粉丝经济、App开发推广等“热搜词”信手拈来，勾勒了大城市打拼浮沉一族的群像图。

景恒街，青年作家如何精准书写“城市乡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黄平曾说：“今天贴着当下现实的创作，风光与风险何在？文汇报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

史。笛安由青春文学出发，现在正走在城市文学的路上。”耐人寻味的是，《景恒街》的故事剧情并不新鲜，普遍人性自古及今并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是环境裂变。笛安的挑战或许在于，对一个新兴都市、新兴行业、新兴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生态环境的描摹，毕竟身处欲望经济的时代，创业图景已迥异于梁生宝时代，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资本与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虚拟经济，人们直接面对符号与数字。

从虚构的“龙城”，步入真实世界CBD附近的景恒街，青年作家如何精准书写“城市乡愁”？

贴着当下现实的创作，风光与风险何在？文汇报的作家谁把城市文学写成熟了，谁就会进入文学

理仍停留在非常传统乃至保守的阶段，接近农耕时代。哪怕这些白领套着看似精致精英的光环，骨子里还是讲那些“婆婆媳妇小姑”的事。

《景恒街》无法移植在其他地方，这部小说是独属于当下中国大城市的，里面的男女主角在其他小地方是看不到的，他们远离家乡小镇，寻求出人头地的机会，带着强烈的都市感。

文汇报：你理解的都市精神特质或气场是什么样的？

笛安：至少每个个体都有选择自由度，有更多可能性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但同时又要承担选择的代价和反噬的力量。这种孤独是都市文明才能催生出的，但那种所谓快节奏与人际冷漠是千篇一律的托词，这孤独真正植根于每个人在现代文明中急于成为“自我”的愿望。每个人能体会某种类似漂浮在海面上的幽静与暖意，又能在这样的孤独中深刻抚慰自己。城市不是纸醉金迷，繁华热闹只是表象的一种，你尽管去拿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城市对人也有磨损和幻灭的部分。

文汇报：《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景恒街》充满了无数属于当代都市更属于人的元素，这部小说显然不是那种以茶盅醇厚，对都市之光的乐于采摘使文本处处散发着表达的亲近感，你怎么看对城市题材的捕捉书写？

笛安：无论是文学还是影视等艺术载体，能够提供给受众这种独属于“都市”情怀的优质表达，实在是少得可怜。在我看来，一些作品有个通病——公司生活、商战环境云里雾里，清晰度不够，城市更多只是“壳子”，其中伦

觉得和以往的爱情有何不同？

笛安：灵境说“这是个坏人的逻辑”，美景恒答“但这个坏人爱你”，这是一段写起来我特别心酸的画面。或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当一个人跨入成年人的世界，固然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景色，但也意味着更多诱惑与责任，与硬核的生活正面相遇，做出选择。只能承受、坚持，然后熬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景恒街》写的是一群不甘心的年轻人，当成功和爱情上升为类似图腾的高度时，执念可能就来了，我们就会被这个念头束缚，以它为中心去生活。

文汇报：写作十几年来，如今的心理诉求和最初有什么不同？

笛安：现在自己都不想了“龙城三部曲”那种特别外露的情绪，一个成熟的作家必须要越过一个坎儿，就是你不能只写你自己，必须要学会写别人，这是一个创作观念的问题。好的创作不应该只是表达自己，而应该要构造出一个世界出来。被肯定、被承认，有掌声当然好，很庆幸现在的我已经跨过让别人承认的执念。

《西决》后，我觉得写作越来越难，写小说对我来说不再是百分百愉悦的事。我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但审美在进步，能力在停滞的时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管怎样，写活一个人物比写活一个观念更加深刻。文学创作一定有一种比传达价值观更强大的力量在，最好能构筑出一个无限阐释的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阐释这部作品。

文汇报：这次写成年人的爱情，你



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演出照。（制作方供图）

中国音乐剧团队携手法美艺术家试水国际制作 音乐剧《乱世佳人》打开新视角

■本报记者 吴钰

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日前登陆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以宏大华丽的舞美和流动感强的音乐带观众重温经典。法语原版的作曲家格拉德·普莱斯居尔维克特意飞来上海，观看了中国团队参与制作的英文版演出。他倍感惊喜：“音乐剧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用更多艺术手段来讲故事，这个版本也带给了人们不一样的视角。”

《乱世佳人》最初是由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歇尔以南北战争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经著名影星费雯丽出演电影后为中国观众熟知。对作曲家格拉德来说，它是全家每年必须重温的经典。女儿成为法语原版中斯嘉丽的扮演者，更让格拉德在剧中倾注了对现代女性命运的人性关怀。

“斯嘉丽演唱的歌曲，音乐风格会随剧情推进而变化：少女时期比较轻快，逐渐加入更多配器、越来越有力，最后是交响乐团的伴奏。”格拉德将斯嘉丽在战火纷飞中从任性的小姑娘，长成坚强勇敢的独立女性，视为创作主要落脚点。“在斯嘉丽的个性中，现代许多女性都能找到共鸣。”对剧中其他角色，格拉德也以风格多样的歌曲传递命运变化的戏剧冲击和人物间强大的情感张力。

作为法国音乐剧行业翘楚，格拉德创作经验丰富，其作品几度来华巡演，都叫好叫座。不过，将电影版4小时的剧情，浓缩到音乐剧的150分钟里，如何取舍？格拉德表示，创作开始前期就已了然于胸，音乐剧重现了斯嘉丽与白瑞德初见、亚特兰大火等电影经典

场景。在斯嘉丽的成长和爱情故事之外，法国主创也融入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乱世佳人》的经典人尽皆知，法国主创默认观众都像共同喜爱这个IP的老朋友，希望能探讨一些深层次的感受、交流各自的观点。如作曲家通过大姆妈和奶妈之口，表达了黑人渴望被命运善待、在阳光下共同生活的心声。”中方制作人乔静透露。

由中国团队参与制作，将法语音乐剧改编成英文版，对中国音乐剧行业来说还属于新的尝试。除了艰难的版权谈判、团队合作的时差问题之外，乔静坦言：“沟通是国际团队最大的成本。从剧本来说，大家都想做深刻的大戏，每个国家对深刻的理解却是完全不同的。落实到具体的舞台细节，审美观念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乱世佳人》音乐剧曾有韩文版的改编，在乔静看来，韩国团队几乎抹去了美国内战的厚重历史背景，将风格改得更偏流行，无法传递原著中人物命运在战争动荡中重新洗牌的戏剧性翻转。为还原美国南方种植园绅士淑女的生活场景，中国团队此次准备了15车布景道具、500套华美演出服和100顶假发为制作升级，力求呈现不输电影的“大片质感”。

据悉，此次演出由中、法、美艺术家联合创作，中国团队主导制作。在选角环节，就从百老汇、伦敦西区及巴黎筛选了近两万名演员和试唱视频，“斯嘉丽”一角可谓千里挑一。上海场演出将持续到1月13日，而制作方也期待此次合作为中国音乐剧行业发展积累新经验。“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